

經濟轉型和政治制度結構如何塑造了企業家的政策影響力，從而，剖析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路徑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企業家的行動以及中國政商關係發展的軌跡。

## 第一節 新興社會階層：國家的盟友

雖然許多研究都基於馬克思和摩爾關於“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的理論預設，但是，它們卻對當前的中國政商關係得出了一個幾乎一致性的判斷，即中國的市場改革和私營企業家階層的興起帶來的並非是對抗性的政商關係。市場轉型使得中國的企業家獲得了結構性的自主性，但是，這些並沒有轉換為對於國家的壓力<sup>1</sup>。也就是說，在中國，市場轉型並沒有催生自主的資產階級。研究者用各種概念來描述這樣一種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相結合的情況。<sup>2</sup>在這種政治經濟秩序下，中國的企業家並沒有尋求系統的政治變革，他們可以忍受或者說甚至支持現有的體制<sup>3</sup>。現有研究從國家與企業家的“融合”、“聯盟”和“吸納”三個層面來揭示這種政商關係的發展。

第一，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融合。在 2004 年中組部和中紀委 2 號文明確禁止任何同時兼任黨政領導和企業負責人的情況下，據全國工商聯 2008 年的“第八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綜合報告”，全國仍有 205 名民營企業主進入地方各級黨政領導機構，其中擔任省級黨委委員的有 4 人，擔任縣鄉兩級政府副職領導的有 61 人<sup>4</sup>。不過，從總

在對於當代中國政商關係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仍然主要關注新型社會階層的政治影響。一個特別凸顯的理論關懷是從馬克思和摩爾關於“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的理論斷言出發，考察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是否出現了一個自主並和國家權力抗衡的資產階級。在這個理論判斷中，資產階級與民主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一個理論的想像是：在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催生了自主的資產階級，它為了階級的利益需要清除專制國家權力的束縛，從而成為政治發展的推動力量；類似地，中國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推動了資源控制的權力向市場的轉移，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國家權力的削弱和諸如民營企業家等新興社會階層的新興。在此理論預設下，大量的已有研究着力於分析這種新興的社會階層是否將同樣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推動力量。本書認為，對於當代中國企業家的研究應當從“政治影響”的主題轉向“政策影響”的主題，深入揭示企業家如何影響中國的政策過程及其實際影響力。進而，在剖析企業家政策影響力根源的過程中，不僅關注到經濟發展和市場轉型如何使得企業家政策影響力逐步放大，而且，特別關注中國自身

1 Pearson, Margaret M. 1997.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Dickson, Bruce J. 2009. “Who Consents to the ‘Beijing Consensus’? Crony Communism in China”, ‘Washington Consensus’ versus ‘Beijing Consensus’ Conference. Yang, Mayfair Mei-hui. 2002. “The Resilience of Guanxi and Its New Deployments: A Critique of Some New Guanxi Scholar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70, No.1; Nee, Victor and Sonja Oppen. 2007. “On Politicized Capitalism”, in Victor Nee, Richard Swedberg (eds.), *On Capit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isot, Max and John Child. 1996.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1, No.4.

3 Wright, Teras. 2010.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全國工商聯：《第八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綜合報告》。

體情況看，在中國，這種形式上直白的“亦官亦商”的情況並不突出。所以，研究者所討論的“政商融合”主要指的是“幹部政治權力和企業主經濟權力的相互滲透”<sup>1</sup>，更多地指向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將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權力<sup>2</sup>，國家日益與私營部門融為一體<sup>3</sup>，以及企業家與國家的融合<sup>4</sup>。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紅色資本家”這個概念無疑特別指明了這種政商融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將那些有體制背景的企業家以及那些具有黨員身份、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職務的企業家統稱為“紅色資本家”，這既包括國有企業的管理層、下海的幹部，也包括幹部的後代和親戚，還包括被吸收入黨、進入政協和人大的企業家。他認為，在許多問題上，紅色資本家的立場與官員並沒有存在質的差異，他們支持深化改革開放，他們力圖成為國家的夥伴，而非對抗者<sup>5</sup>。

第二，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聯盟。如果說政商融合指向的是政治精英與企業家在社會身份和社會關係上的“交疊”，那麼，在這兩個群體相對分離的時候，兩者往往也並非對立和對抗。相反，國家與企業家建立了某種“聯盟”。在這種“聯盟”關係下，企業家在處理與政府的關係時，往往並非通過對抗性的方式去實現自身的目標，而是建立與政府官員的“關係”。<sup>6</sup>

在對改革開放前城市國有企業和鄉村集體經濟中，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和戴慕珍（Jean C. Oi）的經典研究提出，中國不是極權主義政治，也不是利益集團政治，而是以庇護關係為核心的新傳統主義政治，這種庇護關係建立在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基礎之上，是由於個體對國家的依附而產生的一種不平等的交換關係<sup>1</sup>。如果說在魏昂德和戴慕珍的研究中，庇護關係是在國有工廠和鄉鎮企業中存在，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市場化改革催生了新的社會經濟空間，對於新生的社會階層而言，他們是否依然依附於國家並尋求國家的庇護？對於這個問題，許多研究者認為，庇護關係依然在市場轉型中延續下來，並有了新的發展。

在分析中國和東德以及匈牙利等國在八十年代政治轉型的差異性時，魏昂德的學生王達偉（David L. Wank）認為，在東歐國家，民營企業家和其他社會階層結成聯盟，並加強公民社會的力量，從而獲得獨立於國家的自主性，而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導致如同東歐國家一樣的政治後果，這是因為企業家階層與官僚體系的聯繫創造了一種庇護網絡，它既不同於市場關係，也不同於計劃經濟下的指令關係。這種庇護網絡將私營企業家割裂為不同的群體。每一個群體面對不同的機會和束縛，一方面，這使得中國的企業家缺少作為利益集團的統一身份認知；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們與國家持有相似的政治立場<sup>2</sup>。並且，在此後的研究中，王達偉進一步提出了“共生性庇護關係”的概念來描述這種政商關係的新發展。在他看來，在市場改革的轉型期，不再是企業家單向依賴國家的庇護關係，而是企業家與政府相互依賴的共生關係。一方面，政府關於為企業家提供利益和保護；另一方面，企業家也為政府和官員提供財稅、租金和利益。這種庇護關係不是魏昂德所說的新傳統主義下加強了下級對於上級的政策執行的庇護關係，它是瓦解國家基礎權

1 Choi, Eun Kyong and Kate Xiao Zhou. 2001. “Entrepreneur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Rent-seeking”, *The China Review*, Vol.1, No.1.

2 Dickson, Bruce J. 2009. “Who Consents to the ‘Beijing Consensus’? Crony Communism in China”, ‘Washington Consensus’ versus ‘Beijing Consensus’ Conference.

3 Dickson, Bruce J. 2007. “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2.

4 Solinger, Dorothy J. 2008. “Business Groups: For or Against the Regime?” in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5 Dickson, Bruce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Yang, Mayfair Mei-hui. 2002. “The Resilience of Guanxi and Its New Deployments: A Critique of Some New Guanxi Scholar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70, No.1. Wank, David L. 1995.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33. Tsai, Kellee S. 2008.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71, No.1.

1 [美] 魏昂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厚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Oi, Jean C. 1985. “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37, No.2.

2 Wank, David L. 1995.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33.

力的關係<sup>1</sup>。

不過，隨着市場改革的深化，也有研究者提出政商之間的庇護關係正在逐步削弱之中。伽瑟瑞（Douglas Guthrie）就根據上海的經驗調查提出，在中國，與再分配經濟下庇護關係無處不在不同，關係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為市場競爭壓力的存在，完全依靠關係辦事越來越被認為是不恰當，甚至是非法的，因為它與腐敗聯繫在一起，人們越來越依靠法律和規則來辦事<sup>2</sup>。這個觀點很快得到了楊美惠的回應。作為最早提出中國的“關係學”的研究者，楊美惠認為，中國的關係並沒有隨着發展而日漸衰弱，它仍然在不斷適應並塑造新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展現了關係學的韌性和新的運作方式。在她看來，這種關係網絡並非與新的法律和制度結構相衝突，相反，人際關係網絡是市場轉型的功能性需要<sup>3</sup>。類似地，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並不一定帶來的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市場轉型使得市場信息傳播和資源配置不再完全依靠等級式的官僚體系，但是也並非完全依靠市場，信息傳播和資源配置依靠個人化的渠道和方式來實現，各種社會關係扮演了重要作用<sup>4</sup>。

同時，有的研究者也試圖去分析，隨着企業的強大和企業家力量的崛起，企業家是否開始通過利益集團遊說而非原子化的庇護關係去影響政府的政策？對於中國企業的調研發現，雖然企業的遊說越來越成為地方和國家政策過程的一部分，各種商會的數量不斷增加，但是，與西方

不同，中國企業不在正式的場合向官員提供信息，也不參與聽證和委員會調查項目，也不提供具有立場性的報告，它們也不試圖就相關政策影響媒體報道；比較而言，它們傾向於消極地與官員打交道、反映公司具體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關係仍然是最為重要的遊說手段<sup>1</sup>。對於企業而言，他們仍然往往是在圍繞地方政府的關係網絡中運營，旨在建立與政府良好關係的“非市場”策略是企業重要的發展方式。在這種策略中，關係和互惠是政商關係的主要特點。由於中國政府在諸如土地、資金和補貼等資源分配上具有重要的權力，這為企業建立與政府良好關係的緩衝策略提供了足夠的激勵；企業積極為獲得更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進行遊說，爭取成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為公共事業捐贈等<sup>2</sup>。根據1995年對2870個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全國性調查數據，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大都積極地為政府發起的慈善項目捐款以換取政府的承認和政治影響途徑<sup>3</sup>。

第三，政治權力對於經濟權力的吸納。國家不僅在市場轉型中維繫了原有的權力，而且還通過多種方式滲透到新的社會經濟體之中，政府對於新興社會階層積極進行吸納和統合。行業協會、工商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和黨代表等，這些國家所賦予的“政治身份”都是國家吸納經濟權力的重要形式，它使得中國的企業家呈現出很強的“政治嵌入性”<sup>4</sup>。正是這些國家的“吸納”策略，使得中國的私營企業家通過政策和制度網絡與國家捆綁在一起<sup>5</sup>，幹部和企業家之間形成了一個鬆散

1 Wank, David L. 1995. "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 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 in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Guthrie, Douglas. 199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54. Guthrie, Douglas. 2001.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Yang, Mayfair Mei-hui. 2002. "The Resilience of Guanxi and Its New Deployments: A Critique of Some New Guanxi Scholar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70, No.1. [美] 楊美惠：《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趙旭東、孫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 Boisot, Max and John Child. 1996.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1, No.4.

1 Gao, Yongqiang. 2006.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in China and Americ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Vol.6, No.2. Gao, Yongqiang and Tian Zhilong. 2006. "How Firms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Vol.28, No.1.

2 He, Yuanqiong, Zhilong Tian and Yun Chen. 2007.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Nonmarket Strategy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 Vol.24.

3 Ma, Dali and William L. Parish. 2006. "Tocquevillian Moments: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Social Forces*, Vol.85, No.2.

4 McNally, Christopher A. and Teresa Wright. 2010.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for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Order: The 'Thick Embeddedness' of Private Capital Holde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3, No.2.

5 Perry, Elizabeth J. 2007.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Vol.57.



的“聯盟”<sup>1</sup>。因此，市場轉型並不會帶來反對國家權力的企業家階層的興起。

在分析大陸與台灣經濟發展所帶來後果的差異時，蘇黛瑞（Dorothy J. Solinger）認為，大陸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則是在政權的培育下成長起來，並被收編到政權之中，這種“收編”使得新興的企業家階層成為國家的支持者而非反對者<sup>2</sup>。同樣，狄忠蒲也認為，中國政權體制的穩定性在相當大程度上根源於政黨的“適應性”，而這種適應性正是體現在市場轉型過程中政黨對於企業家階層的吸納和統合。雖然狄忠蒲認為，這種對於經濟精英的政治吸納是一把雙刃劍，蘊含了讓政治反對力量進入政權推動“內部革命”的風險，但是，它卻也是現有政權鞏固統治、加強對於新興社會精英掌控的重要方式<sup>3</sup>。

除了吸納私營企業家之外，國家還統合相關社團，發展出了包括個私協和工商聯等在內的各種制度化聯繫，以求推進經濟發展和加強與社會群體的聯繫<sup>4</sup>。在對現有官辦社團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個體勞動者協會和私營企業協會這樣的企業家社團並不代表能夠抵禦國家力量的公民社會的成長<sup>5</sup>，它們並未如有的學者所預測的那樣能夠代表會員的利益來反對國家<sup>6</sup>；國家推動個私協成立的初衷也不過是幫助國家實現其在市場領域社會控制的目標，而非利益的表達和聚集，並且，個私協在實踐

中已日益變成了相關部門謀取預算外資金的工具<sup>1</sup>。福斯特（Kenneth W. Foster）對於煙台個私協的研究<sup>2</sup>、南威特（Christopher E. Nevitt）對天津市級和區級個私協的研究<sup>3</sup>，以及安戈（Jonathan Unger）對於北京市朝陽區個私協的研究<sup>4</sup>，都認為從私協的運行並不能夠看到自主的公民社會的成長。此外，國家推動行業協會的發展實際上也只不過是一種政府控制下的“利益契合”<sup>5</sup>；國家也缺少動力解決商會所存在的國家主導性和自主性兩者之間的張力問題<sup>6</sup>。對於溫州商會的研究也發現，溫州商會的發展的重要經驗在於，商會與地方政府之間建立起了良性互動關係<sup>7</sup>。對全國工商聯第一至第十屆共 204 人的高層人士變化進行的跨時段比較也發現，工商聯並沒有真正的民營企業家擔任領導職務，在副職民營企業家所佔比例也不高，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影響力仍然較低<sup>8</sup>。總的來說，“國家領導的公民社會”被用來形容這種國家對於社團組織的干預和控制<sup>9</sup>。

這種國家對企業家的“吸納”和對商會的統合瓦解了企業家之間的橫向聯繫，企業家往往並不通過內部合作或者與其他社會群體成員合作來追求目標的實現，而是通過與更高地位和權力的個人對於忠誠的交換

- 1 Choi, Eun Kyong and Kate Xiao Zhou. 2001. "Entrepreneur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Rent-seeking", *The China Review*, Vol.1, No.1.
- 2 Solinger, Dorothy J. 2008. "Business Groups: For or Against the Regime?" in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3 Dickson, Bruce J. 2000.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5, No.4.
- 4 Dickson, Bruce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 White, Gordon,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1996.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Parris, Kristen. 1999.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terest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Scott. 2001. "In the Company of Mark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Ph.D Dissertati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 1 黃冬姬：《轉變中的工商所：1949 年後國家基礎權力的演變及其邏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8 年版。
- 2 Foster, Kenneth W. 2002.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Yantai", *The China Journal*, Vol.47.
- 3 Nevitt, Christopher E. 1996. "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 *The China Journal*, Vol.36.
- 4 Unger, Jonathan. 1996. "'Bridges': Private Busin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47.
- 5 江華、張建民、周瑩：《利益契合：轉型期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一個分析框架——以行業組織政策參與為案例》，《社會學研究》2011 年第 3 期。
- 6 Pearson, Margaret M. 1994.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31.
- 7 陳剩勇、馬斌：《溫州民間商會：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溫州服裝商會的典型研究》，《管理世界》2004 年第 12 期。郁建興、江華、周俊：《在參與中成長的中國公民社會：基於浙江溫州商會的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 8 楊穎超：《中國大陸新興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初探：政治組織席次角度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4 卷，2010 年第 1 期。
- 9 Frolic, Michael. 1997. "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pp.47-67.

來追求個人目標<sup>1</sup>。結果是，國家和企業家之間的密切關係瓦解了企業家階層內部任何橫向組織聯合的傾向。相反，是一個等級分明的階層的形成<sup>2</sup>。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家的自主的橫向組織發展非常的遲緩。

## 第二節 企業家與國家：共享利益和共享價值

從以上文獻評述中可以看到，與關於資產階級在政治發展進程中作用的預測不同，在對中國政商關係的研究中，研究者認為，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自主並與國家力量抗衡、從而推動政治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出現。相反，出現的是國家與企業家的合作而非對抗。那為什麼政商之間形成了這種共謀關係？

在已有研究中，政商關係的這種共謀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即共享價值和共享利益。企業家對於現有的政權和體制的認同奠定了他們政治行動的基礎；共享利益則在於政商之間緊密的利益關聯：一方面，國家權力的維繫是企業家依附於國家的根源；另一方面，發展型地方政府下對於經濟增長的追求和官員本身的利益驅動則使得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企業和企業家產生了依賴。這兩者都將政商兩者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構築了它們共謀的利益基礎。

第一，共享價值。現有的數據顯示，較之於黨員身份和與政府的關係這兩個因素，民營企業家的主觀價值對於他們的政治支持影響更大<sup>3</sup>。根據一些問卷調查的發現，民營企業家之所以沒有成為自主並與國家抗衡的力量，很重要的根源在於他們對於現有的政權和制度的政治認可，不同的抽樣調查也都同樣地顯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對於民主價值的保留態度。

- 
- 1 Zhou, Xueguang. 1993.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8.
  - 2 Bruun, Ole. 1995. "Political Hierarchy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in a Chinese Neighborhood", in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3 Chen, Jie and Bruce J. Dickson. 2008.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6, No.4.

1999—2005 年，8 個縣和縣級市民營企業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共產黨員與民營企業家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上的立場基本相似，他們對於對經濟改革速度和政治改革速度的滿意度都很高，大多認為速度正好，他們傾向於維持現存秩序<sup>1</sup>。並且，根據 2006—2007 年 5 個沿海省份民營企業家的抽樣調查，數據表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傾向於支持現有政權和既有體制。其中，民主價值、生活滿意度、對於政府政策績效的評價以及對於官員腐敗的感知，都是決定民營企業家是否支持現政權的重要影響因素<sup>2</sup>。

也有研究者對企業家階層進行了內部的劃分，陳安就將中國的企業家分為寄生型和白手起家型。他認為，不是所有的資產階級都是支持自由民主的，當資產階級從自由市場競爭中獲利的時候，他們支持自由民主，但是，資產階級總是希望進入國家權力中心，當他們的位置被確保的時候，很少為了政治參與的進一步擴展而鬥爭。他們本質上是腐敗和不受限制的國家權力的寄生依附品，有強大的利益驅動去維持現存政權。比較而言，白手起家的資產階級有可能發展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然而，對於中國的這部分企業家的訪談卻顯示，他們支持法治，卻對法治之外的民主沒有要求，他們並不是民主的支持者。總的說來，中國的企業家階層依附於國家，他們並未將他們的利益與民主化聯繫起來<sup>3</sup>。此外，郎友興對於浙江民營企業家的問卷調查和訪談也證實，“無論入黨，當選人大代表，還是參與村委會競選，基本上屬自我保護型的政治活動”，他們的政治參與，不是對抗政治，他們並沒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sup>4</sup>。

- 
- 1 Dickson, Bruce J. 2007. "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2.
  - 2 Chen, Jie and Bruce J. Dickson. 2008.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6, No.4.
  - 3 Chen, An. 200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7, No.3.
  - 4 郎友興：《政治追求與政治吸納：浙江先富群體參政議政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